

伊北：淮南，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杨道文

今年7月底,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正式发布,淮南籍作家伊北携长篇作品《六姊妹》荣登IP影响榜。作为获奖代表,伊北在现场深情道出心声:“《六姊妹》这部作品,反映出我们安徽百姓的质朴平实,以及对于日常生活的投入和热爱,从城市的历史、家庭的历史以及个人的历史的嵌套,充分体现了淮南这座城市的历史底蕴,我始终觉得《六姊妹》是一种唤醒,也是一种召唤。”他进一步谈到,不仅仅是《六姊妹》,还有武王墩的发掘、今年央视总台“淮水月 淮南见”中秋晚会在淮南举办,都是淮南文化景观的宣传。言语未落,一句真情告白打动众人:“我的家乡淮南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一句发自肺腑的赞叹,不是简单的游子乡情,而是回望淮南历史文脉、人间烟火的同时,对时代机遇交织共生的由衷认同。淮河奔流千载,浸润淮南大地,古老楚风汉韵在此沉淀,平民烟火在此生长,新时代文化浪潮在此奔涌。当文学书写、考古发现、国家级文化盛典相继汇聚淮上,让我们得以读懂淮南,知如何以淮南。

笔墨寄情故土,文学叙事唤醒城市年代记忆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学,对于土生土长的伊北而言,他的创作扎根在故乡的土壤。其笔下的《六姊妹》,以淮南大通、田家庵为叙事原点,横跨数十年光阴,描摹普通百姓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小说将个人命运、家族变迁嵌入城市发展宏大图景,煤城街巷、淮河渡口、市井老店跃然纸上,安徽人民踏实坚韧、热爱生活的精神气质流淌于字里行间。这部源自淮南、书写淮南的文学作品,从网络文学赛道突围,登上国家级影响力榜单,改编影视剧风靡全国,让

千千万万观众透过一个家庭,看见淮南真实鲜活的城市底色。

在伊北看来,《六姊妹》承担着“唤醒”与“召唤”的使命。它唤醒本土民众尘封的城市记忆,让老淮南人的年代生活往事重新被看见;它召唤远方的目光,吸引各地读者循着文字奔赴淮河之畔,探寻故事背后的城市。文学是深情告白。淮南拥有丰厚的叙事资源,《六姊妹》的成功实践证明,植根本土风土人情、聚焦普通人悲欢冷暖的文艺创作,最具备打动人心的力量。这片土地上质朴宽厚的民风、代代相传的奋斗精神,正是文艺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每当游子回望故土,最先眷恋的,永远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

文脉贯通千年,文明积淀筑牢城市精神根基

如果说《六姊妹》记录淮南的当代烟火,考古遗存、传世典籍则铺展这座城市跨越千年的文明长卷。伊北谈及淮南文化景观时,首先提及武王墩墓考古发掘这一重大文化事件。武王墩墓作为国内经科学发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战国晚期楚王墓葬,出土上万件(套)珍贵文物,刷新学界对楚文化、江淮文明的认知。沉睡两千余年的楚国礼乐重器重见天日,实证战国晚期江淮地区的文明高度,让淮南作为楚文化重要承载地的历史定位更加清晰。楚风浩荡,穿越时空,必将在今天重新焕发时代光彩。

淮南文脉,远不止一处楚王陵,诞生于此的《淮南子》,系统记载嫦娥奔月、二十四节气等中华经典文化符号,构筑中华民族浪漫的精神原乡;寿州古城历经岁月洗礼,留存无数先贤廉政典故、人文传说;淮河蜿蜒流淌,孕育开放包容、刚毅务实的淮河文化。楚汉文脉、淮河文化、工业记忆在这里层层叠加,古今文明

在此交汇融合。深厚绵长的历史底蕴,赋予淮南独一无二的文化辨识度。行走淮南,一砖一瓦有故事,一山一水有文脉,厚重的历史底蕴,是一座城市最持久的底气,也是游子心底最深的牵挂。

盛会汇聚资源,文化名片提升城市国际形象

“淮水月 淮南见”,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落户淮南,成为今年备受关注的文化盛事。中秋月圆、淮水汤汤,这场面向全球华人的国家级文化盛典,将以明月为纽带,向海内外展示“月亮之城”淮南的独特魅力。《淮南子》最早记载嫦娥奔月,月亮文化与淮南有着与生俱来的渊源,秋晚落地淮南,是中华传统月文化的寻根之旅,更是城市文化品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重大契机。

武王墩考古发掘惊艳世界,《六姊妹》斩获全国重要文学奖项、央视秋晚重磅落地,一系列标志性文化事件接连发生,并非偶然。这是淮南长期深耕文化建设、持续挖掘本土文化资源、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果。过去,不少人对淮南的印象局限于煤炭和豆腐的一黑一白,如今,考古、文学、影视、智库思客会、文艺盛会轮番登场,多元文化事件串联起来,共同塑造出层次丰富、立体多元的城市文化景观,不断打破既有印象,让大众看见兼具历史厚度、人文温度、时代活力的全新淮南。如今又有了国家级平台加持,让淮河之畔的淮南,拥有更大舞台讲述自身故事。

乡情牵挂游子,故土眷恋凝聚城市内生动力

“我的家乡淮南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伊北的感言,道出无数在外淮南游子的共同心声。乡情,是最朴素也最动

人的情感。无论走多远,故土的风俗、味道、记忆始终烙印心底。这片土地滋养出的人民,既有淮河儿女的豪爽坚韧,又有江淮民众温和务实的品性。从古代先贤到当代文艺创作者,一代又一代淮南人从淮畔出发,奔赴各地建功立业,却始终心系家乡。

在外乡贤是城市宝贵的资源。故土滋养创作者,创作者以笔墨回馈故土,形成双向奔赴的良性循环。当代知名作家伊北依托文学创作,持续挖掘淮南本土故事,用作品宣传家乡,正是乡贤反哺故土的生动范例。今年他成功当选淮南市作协主席,由他执笔剧本的电视剧《华丽人生·逆风者》刚刚在淮南杀青,目前在平台预约中,近期即将播出。一座城市的魅力,不仅在于风景名胜、历史古迹,更在于生长于此的人。淳朴向善的民风、守望相助的邻里、代代延续的奋斗精神,构成城市最动人的底色。这份独有的人文气质,让每一个远行的淮南人,无论身在何方,心底永远留有归处。

淮河奔流不息,淮南文脉绵长。伊北“我的家乡淮南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的由衷感慨,是游子对故土最深切的礼赞。当下的淮南坚持守正创新,一边守护武王墩楚文化遗存,《淮南子》思想、寿州古城等千年文脉,一边借力《六姊妹》文学IP、央视中秋晚会等重大文化契机,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艺相融、历史资源与时代传播互通,推动文旅、文创、影视产业融合发展。楚风汉韵、淮水风情、工业记忆、市井烟火在此交织共生,持续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动能。所谓最好的故土,不在于毫无缺憾,而在于有历史根脉、有人间烟火、有温暖温情、有前行希望。扎根深厚文脉、勇立时代潮头的淮南,必将持续绽放独特魅力,成为无数人心中牵挂向往的精神家园。

千年楚文化汇聚寿春(下)

王晓珂

江淮地区的楚文化是一种外来文化与土著文化结合的产物,是楚入江淮以后才发生的,融合江淮土著文化而发展的。约五百年时间里,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春秋中期,即楚入江淮的前期。楚此时虽进入江淮,但作为外来文化的楚文化在这个地区还没有形成融合和取代土著文化的趋势。从出土文物看(主要指青铜器),至少土著文化还占有绝对优势。

春秋晚期,是楚入江淮的中期。楚文化开始进入江淮,并与江淮土著文化发生融合。此期虽有吴、越介入,但在文化方面未起什么影响作用。

战国初期蔡昭侯26年,避楚就吴迁都州来——即下蔡的境地。蔡国从迁都到州来至公元前447年被楚灭掉,仅46年。葬器的出土,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出土文物史上少有的。成套的礼器,组成的乐器,大批的车马器,制作精美,花纹瑰丽,不仅是研究青铜器重要和较完备的材料,考古专家把“蔡器定为楚系”,解决了一些器物系位、名称问题,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字、音乐、美术、工艺、交通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最好材料。

楚灭蔡为楚入江淮的后期,是楚文化在淮上发展的鼎盛时期。屈原作为楚文化的代表诗人,以极大的爱国热忱,用爱憎分明的诗词歌赋,抨击时弊,讴歌进步,其艺文作风对后世影响极大,对汉文化的影响起决定作用。1953年,屈原作为楚文化的代表“爱国诗人”,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可以断定,没有屈原及其著作,即没有“淮南国文化”与“建安文学”。

近年,更有不少专家学者论述楚文化的特殊成就及其对战国、秦汉文化的影响,指出:“楚文化影响后世之大,以至征服了汉代文化,是汉代文化的直接来源。”楚文化是独立于中原文化之外的特殊文化,屈原的作品便是这种文化的集中体现。总之对楚文化的成就、作用估价十分之高,甚至超过了中原文化。

由于楚避秦东迁,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徙都寿春,寿春作为楚都,成了“楚文化”发展鼎盛时期反映的集中表现地。从出土大量的青铜器、陶器、漆器等都与两湖地区楚文化相同而又有改进的文化面貌与特征。1933年寿县朱家集出土了大批的楚青铜器,蔡侯墓出土的青铜器是寿县出土的第二批青铜器群。大部分青铜器有铭文,多蔡侯字达

90余字,这些铭文说明了当时蔡国的历史情况,也提供了春秋中晚期蔡、楚、吴三国关系的种种资料,为研究公元前五世纪的历史提供重要资料。如淮上原属吴,归楚后,吸收吴文化因素,制出的剑带血槽;方鼎演化成圆鼎带盖,素面蹄足;铜方壶演变等。“进入战国后期,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却消失了,被与武王墩墓风格相似的楚文化特征竖穴土坑墓所代替,楚式棺槨代替独木棺,此前以原始瓷和印纹硬陶为主的随葬品也被楚文化特征的陶器、仿铜陶礼器、人俑、漆木器等所取代。这些现象表明,在楚国历史的后期,楚文化在整合南方和东方文化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楚人灭了越国、驱逐了越人以后,在吴越地区楚文化不是继承越文化,而是覆盖了越文化。虽然春秋战国时期在吴越地区吴文化、越文化、楚文化是前后相继的,就像是三叠层一样,然而它们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替代与覆盖。武王墩墓的资料为我们探讨楚国如何经营东方地区、楚文化如何整合东方和南方文化,进而认识楚国、楚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提供了重要实证史料。

寿春汇聚楚文化诸多因素之精华,如楚寿春城遗址的建筑艺术及其宏大规模;引进水稻的栽培与芍陂的开拓;楚金币“郢爱”的铸造与发行;“鄂君启节”的使用,标明楚国商业、交通运输工具的进步与发达;大量青铜的冶炼与青铜器的铸造,融文字、书法、镶嵌于一炉,如“鄂君启金节”“大府铜牛”“栾书缶”等。即便是蔡侯墓、楚王墓出土的青铜器中大量的炊餐具,窥其春秋战国时期的吃穿住行,也充分反映楚地物质文化生活的实际水平,从而显示楚文化的先进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武王墩墓,迄今为止经科学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楚国高等级墓葬,为今人揭开了战国时期楚文化的神秘面纱。楚国丧葬习俗、社会等级与礼乐制度、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珍贵资料,通过精细化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得以窥见古人的衣食住行、祭祀、娱乐和科技水平,以及楚国宫廷的职官设置等历史信息。

楚文化虽然以秦统一而告终,但作为楚文化这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意识形态文化,是不会随着朝代消亡而消亡的。它已经并必然作为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而惠益寿县、安徽乃至整个中华民族。

从“金石为开”说淮南为古豫章地

周强 杨倩



淮南人大多知道,今淮南市域为秦九江郡和西楚九江国地,得名于《尚书·禹贡》“九江孔殷”,即众水汇集、河道宽广之义,这非常符合江淮之间地形与水文特征。当时江西全省都归属九江郡,后来九江郡改名淮南后,九江不再是行政区划名称。一直到公元1361年,朱元璋攻占江州,改江州路为九江府,九江才重新成为行政区域名称。

淮南人很少知道,还有一个地名和九江一样,也是从古淮南地区转移到江西的,那就是豫章,现在是江西省会南昌市的别称。

这事要从成语“金石为开”说起。金石为开是说像金、石那样坚硬的东西也被裂开,比喻对人真诚,能产生极大的感动力量;也比喻意志坚定,能克服一切困难。此典出自西汉刘向《新序》,主人公熊渠是楚国第六代国君,与淮南的关联就是“越章”之地。

熊渠不仅是楚国国君,还是位射箭高手。传说有一天夜里,熊渠独行山路,见到前面的路旁有一块大石,以为是一只老虎匍匐在那里,于是急忙弯弓搭箭,对准“老虎”就“嗖”地一箭射了过去。熊渠心里还想,我这一箭射去,不但一定能射中,而且还必定要它的命。谁知道那“老虎”趴在那里,纹丝不动。熊渠疑惑,于是小心翼翼地近前观看,才发现那是块大石头,自己的箭已经整个扎进石头里,连箭翎都深深没入而看不见了。于是刘向感慨地说:“熊渠子见其诚心而金石为之开,况人心乎?”(《新序·杂事四》)

熊渠大体与周夷王同时,是楚国早期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继位后在江汉之间很得民心,于是兴兵北伐今湖北省竹山县一带的庸国,东伐长江中游的扬粤,进至今湖北鄂州市一带,使楚国从鄂西山区扩张到了江汉平原。而此时的西周王室则明显衰弱,以致“荒服不朝”,偶有诸侯来朝,周夷王就激动不

已,不顾天子至高无上的周礼规矩,屈尊下殿迎接,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熊渠认为,周天子封楚国为子爵的爵位过低,于是趁王室衰微,公然“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史记·楚世家》)。熊渠在心理上认为,你周天子不过是一位王,而我则是王们的父亲,以此来表达对周天子的嘲笑。周夷王去世,周厉王即位,因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于是取消了诸子的王号。

熊渠所封三王中,“越章王”即豫章王,而豫章地与淮南有着很大关系。进入春秋,豫章更是频繁出现,六次成为吴楚战争的战场或楚军驻屯的军营。因为司马迁说三王封地皆为“江上楚蛮之地”,没给出具体地望,因此后世对豫章所在分歧很大。《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归纳说,豫章为“春秋楚地”,今地的说法有7种之多。

说豫章为一地的说法有4种:1.今江西修水、锦江流域及南昌、丰城、进贤等市、县地;2.东从安徽中部起,西至河南息县、湖北红安县,南从江西鄱阳湖地区起,北至安徽西北部,皆为楚之豫章地;3.今安徽凤阳县以西,包括淮河以南的光山县以东,霍山县以北地区;4.豫章专指今安徽寿县、合肥间连接淮河与巢湖的通道地带。说豫章为两处以上的说法有3种:1.豫章有淮南、江东两处;2.豫章有淮南、江南两处;3.豫章有淮南、江东、江南三处。全部7种说法中,竟有6种与淮南有关,但基本都是大范围的泛指,唯有寿县、合肥之间的通道地带比较具体。黄鸣《春秋列国地理图志》(文物出版社)的观点基本相同,认为春秋时期的豫章“在今鄂豫交界的汉水之东与安徽淮南的广大地区”。

公元前201年,即汉高祖刘邦称帝的次年,分庐江郡置豫章郡,郡治南昌县,属淮南国,豫章之名从此转入江西。至于成语“金石为开”,东汉王充《论衡·感虚篇》在叙述了“尧射十日”(《淮南子》中是“羿射十日”)的故事后说,“精诚所加,金石为亏”,使之演变为复合性成语,最终到明朝形成现在的格式“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考烈王的盛宴（一）：稻香千年

萧阳

落里,楚人用榭树叶精心包裹的粮食,穿越历史烟尘涌现在考古人员眼前。

在楚人的方位观念中,东方象征着生长与开端。这些粮食包裹位于东侧室,与青铜礼器相邻,恰好契合粮食的生命属性。

堆积的榭树叶,叶脉清晰可见。轻轻展开层层榭叶,稻、黍、粟颗粒如同时光琥珀般洒落。两百多个榭叶包,仿佛是时间的粮仓,把稻、黍、粟耐心地保存了两千多年。楚人的生命气息仿佛仍在这些尚未完全碳化的谷粒间脉动。

榭树叶片宽大、质地坚韧且带有独特的清香气味。现代科学研究表明,榭叶中含有多种挥发性物质和抗氧化成分,能够为包裹的食物增添风味,可能还具有一定防腐作用。今天河南、陕西、山东等地的山区依旧保留着端午时节采摘榭叶制作“榭包”或“榭叶粽”的习俗。

包裹中的谷物颗粒均为未脱壳、未蒸煮的原始状态,是作为丧葬仪式的象征性食物。外壳的保护也使得谷物在幽暗墓室中保持密闭、隔绝菌虫,实现了跨越千年的储藏奇迹。

不禁让人想起“最古老的粽子”——河南信阳城阳城遗址八号楚墓出土的榭叶粮食包裹,其中保存完整的有

39包稻谷和1包黍。而等级更高的武王墩,保存了更多的“楚国粽子”,在水淹条件下同样幸运地地在后人面前出现。

楚国物产丰富,国力强大。《楚辞》《史记》等古籍中“五谷六仞”“粟支十年”的描述,连同武王墩出土的大量谷粒遗存,共同印证了楚国充沛的粮食产能。

在武王墩发现的不同类型粮食遗存之中,以稻谷最多。楚地河网密布,气候湿润,自古以来是水稻主产区,江淮地区的先秦考古中常见有稻谷遗存。武王墩地处南北分野的淮河流域,数千年来稻米一直是当地人的主食。江陵凤凰山、云梦郑家湖、淮南武王墩……这些地方出土的稻谷遥相呼应,共同勾勒出两千年前楚国稻作农业的繁荣图景。

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黍和粟就已传入淮河流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江汉平原也开始出现北方旱作物的身影。战国时期,黍和粟已成为楚国种植业生产的一环,为楚人的主粮食谱增加了选择。楚地环境的水陆兼备、楚国发展的海纳百川、楚人性格的开拓创新,在水田与旱地相结合的多元化种植制度中得到充分体现。

在高等级墓葬中的粮食陪葬品,多存放于青铜器中。武王墩“九鼎八簋八

簠”的青铜器组合中,簠就是专门盛放黍、稷、粱等饭食的器具。而八件青铜簠中的一件,器身刻有铭文“楚王禽前作铸金簠以供岁尝”,标明了这件器物的“岁祭”用途。

古人将土地与粮食并称为“社稷”,象征国家政权。“凡王之馈,食用六谷”,粮食不仅是生命之基,在古代礼仪和祭祀场合中也扮演极为重要角色。从武王墩和其他楚墓中出土的粮食遗存中,就可窥见一斑。

食为政首,民以食为天。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墓葬中,就常见有粮食随葬。《楚辞》中描绘了灵魂归处“稻粱饷麦,挈黄粱些”的场景。楚地巫风盛行,楚人相信冥世与现实世界相似,重生的灵魂也需要食物来维持生计。

意义早已超越食物本身。一粒粒承载着楚人勤劳与智慧的稻、黍、粟,是南北农业交流的实物见证,也是楚人生死观和宇宙观的具象表达。

相信随着后续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深入,武王墩的这些粮食遗存将讲述更多关于楚国和中华农耕文明的故事。武王墩遗址考古公园建成后,也将伴着一阵阵稻香与麦香,继续守望淮河岸边这片古老而充满生机的热土。

“楚越之地,饭稻羹鱼。”《史记·货殖列传》中的短短八字,勾勒出先秦时代南方大地上的饮食图景。两千多年后,淮南武王墩墓考古现场东侧室的幽暗角